

健、李陆史等五、六位作家。

下面将从中国接受这些韩国作家的情况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

首先看看最近十年韩国接受鲁迅的新动向。我们可以将其总体特点概括为“突出的本土化特点”吧？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翻译的多样兴盛发展是第一个特点与成果，那么，我们在下面可以评述另外五种特点与成果。

第二个特点与成果是韩国鲁迅接受史上个别资料的挖掘、研究的进展和韩国本土性与东亚视角下的总体历史叙述和理论的建构。洪昔杓的《鲁迅与近代韩国：为东亚共存的思想》（2017）^[5]与崔珍豪的《被想象的鲁迅与现代中国》（2019）^[6]可以算是这方面的成果。笔者也曾经主编过《日帝统治下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三部（新闻编，杂志编，翻译编，2007）^[7]，里面也包括鲁迅，资料相当齐全。洪教授扩大视野，也查访不少中国历史现场和人物，也进一步把东亚各国的资料加以发掘并探研。他在审视东亚有机的历史背景的宽阔视角下，对跟鲁迅来往的或者关注鲁迅的、翻译鲁迅作品的吴相淳、柳树人、梁白华、丁来东、金台俊、申彦俊、李陆史、金光州、李明善等韩国知识分子9位进行较为有深度的探索，获得了不少新成果。崔珍豪也在韩国本土性与东亚现代性视角下，在总体历史叙述和理论的建构方面提出了很多新观点，得到了非常丰富的新成果。对这百年历史分为殖民-解放期、冷战期、后冷战期三个时期，充分考虑各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有机交叉性的分析，详细探究了

韩国各个时期各个翻译家、学者、社会运动家等知识分子从何种立场，又如何接受鲁迅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把握了当时东亚局势视角下思考各种围绕鲁迅的学术问题，执笔论调也相当可观、稳健、持重。

第三个特点与成果是韩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喜欢将鲁迅作品中有吸引力的部分和生活场面引申到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某些环节里，当作反观、反思的资源，出版有实践性感悟的内容，现实性与独创性很强。在日本帝国统治时期和美军政以及长期军部独裁时期里，韩国知识分子在鲁迅那里找到对日帝强占统治的批判、抵抗的思想资源或者民主变革运动的精神资源。那么，进入文化消费主义时代的21世纪，怎样才能继承和发挥鲁迅的实践性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发挥内功撰写的，可以举出李旭渊的《阅读鲁迅的夜晚—阅读我的时间》（2020）^[8]与成媛（音译）的《与鲁迅在一起》（2020）^[9]以及李希卿（音译）的《鲁迅与家族，围绕家族的奋斗》（2020）^[10]这三部作品。李旭渊书中的一些章节的题目是“记忆与忘却使用法”、“在背叛‘努力’的社会怎样生活”等，其具体性可窥见一斑。

第四个特点与成果是发挥韩国人文学者的特点，站在各种立场和利用各种方法重新构成鲁迅传记。韩国的鲁迅专家或者进步人文学者估计都有撰写有韩国特色的“鲁迅传记”的梦想。但是这谈何容易？后来中国王士菁、朱正、林贤治以及王锡荣、日本竹内好与藤井省三等的鲁迅传记的韩文版出版。韩国一些鲁迅专家与人文学者受到刺激，也站在韩国本土立场上撰写了鲁迅传记。例如，朴洪奎的《勇敢地去吧，孩子！》（2016）^[11]与高美淑等六人的《鲁迅，没有路的大地》